



建橋：中國歷史上的基督宗教訊息

楊意龍著

黃美兒譯

中國的近年來改革，促使研究中西歷史的專家，重新審視對往日中國基督徒活動的兩種看法。其一是隨着四九年共黨統治中國，基督信仰曾幾乎完全被抹去。從數字看這可能是對的；然而，基督宗教今日已成爲國內信仰重要的一環。其二是如果沒有帝國主義，基督徒對中國會有更深遠的影響。

這兩種看法都有需要修正的地方；一是由於對中國基督宗教歷史所知日多，也因為中國要再一次面對外來的影響。馬克思—列寧主義是從外輸入的，但中國共黨領袖們堅持說毛澤東創造了一種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」。換言之，因爲共產主義中國化了，所以被接納，其他外來的思想，尤其是資本主

義，必須要遠離。

那些熟悉中國近況的人都知道，中國化的社會主義逐漸出現腐爛現象，年青的一代輕視這主義而崇洋、慕洋；與此同時，西方的思想像數百年來一樣，以很多不同的形式出現。

如果說共黨在中國已日漸式微，可能是言之過早，但已有很多徵兆可見到，縱使它在政治上仍保持着主宰地位，相信在不久的將來，中國會漸漸接納不同的信念和意見。蘇維埃聯邦的瓦解和東歐戲劇性的轉變，令人難以相信中國的共產黨能有效地面對各種挑戰。六四民主運動可以用武力鎮壓，但它的影響默默地向中國共產黨挑戰。如果要生存下

去的話，共產黨必須快速地改革。

從歷史角度看外來的思想

在中國歷史上，外來的思想多次流入中國，最有趣的是，當政局不穩定和社會動盪時，中國人便會採用外來的信念，佛教便是個很好的例子。

另一個較新的例子，就是基督教信仰。一六一零年耶穌會的先鋒傳教士抵達北京，那時適逢明朝衰落，面臨政治危機，利瑪竇和他的同夥嘗試用基督徒的倫理觀取代或補足儒家精神。

在十六、十七世紀時，並沒有帝國主義這回事，所以，從外表看來，利瑪竇的「適應政策」是成功的，很多儒家學者都接受了基督教訊息，好像徐光啓和楊廷筠，都相信做一個儒家基督徒是可行的。直到今天，仍有人認為，雖然基督宗教信仰與儒家倫理的歷史背景截然不同，但彼此是相容的。

儒學和基督信仰有什麼共通點？那是個神哲學的問題，這篇文章無意介入。細察歷史，可見到利

瑪竇和他的耶穌會同伴是透過儒家這個大傳統，將基督宗教「偷運」入中國。他們認為，最重要是說服儒家學者，因為只要儒家學者相信可以有一種儒化的基督信仰，其他的人民自然會跟從。

耶穌會士適應的方法是走大傳統的路線，忽略了次要的傳統，難怪他們成為儒家學者、晚明和清初皇帝的「謀士」。但當傳教士與儒家學者發生問題時，過去的成功便逐漸褪色，甚至使整個基督宗教信仰遭殃。當人們見到基督徒的行為不符合他們的信仰時，基督信仰便不再被視為「倫理的準繩」而被人接受（康熙帝是其中一個例子）。

到了十九世紀，基督徒傳教的方式，與從前的耶穌會士大相逕庭。

外來思想與帝國主義文化

到十九世紀為止，禮儀之爭完全掩蓋了利瑪竇行之有效的適應方法。基督教的傳教士採取一種不妥協的方法，尤其是對某些習俗和宗教信仰方面，

因為他們知道有些傳統習俗，連中國人本身都不贊同，纏足和吸鴉片就是其中一、二端。此外，砲艇外交是西方入侵中國的方法，傳教士往往混在中西武力糾紛之中，有時甚至是這些事的成因。

文藝復興時代的基督宗教信仰和十九世紀的基督宗教信仰是兩回事。對一般中國人來說，他們都不能分辨天主教和基督教之別，總之，基督宗教信仰就是西方的帝國主義。

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基督宗教信仰被利用為攻打中國「封建」的武器，皈化了的洪秀全和孫逸仙，都有他們的方法來反對儒家傳統。洪秀全相信四海一家，並徵募女兵來抵抗滿清軍隊。孫逸仙破除家鄉神廟中的偶像。他們的「基督徒行為」，曾影響人們去反對封建；但另一方面，中國共產黨則將基督傳教士看作為「文化」帝國主義者。

無疑，有些文化的帝國主義者曾嘗試改變當地的習俗與信仰。他們有不少覺得中國文化太落後粗野，難以接受，所以不將當地人的觀感放在眼內，

又干涉內政；結果造成一些反傳教士的運動。史實記載，衝突是不能避免的。到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葉，除了少部份外（例如李雅各和李提摩太），傳教士都放棄了接觸上層社會，儒學被視為障礙；他們更認為，官僚應對中國的落後負責，很多中國習俗是迷信和政治腐敗的反映。

西方勢力不斷入侵，中國屢戰屢敗，在儒家學者飽受侮辱後，一些中國人才無可奈何地運用西學，但他們不是接受西方的道德及價值觀，恐怕失去「中國人」的特質。要挽救中國政治的危機，需要一種較新的君主政體；而在精神方面，中國人必須堅守他們的根。在這種心態下，張之洞才想出「體用論」，即以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。如果除去本質，便再沒有中國文化。難怪中國共產黨採用了張氏的國家主義文化，即中國的共產黨思想必須具有中國特色。

毛澤東思想其中一點是將共產思想特質滲入「傳統」；但封建的傳統必須清除，其他較次的習俗

應保留（當然，假如小傳統是腐敗勢力的遺物，是不能容忍的，結果知識份子必須經常受控制）。

當共黨在鄉間和省區希望獲得信任，而部份傳教士團結起來對抗，於是共黨便在鄉間掀起不少反基督徒的運動。

尋求其他可能性

鄧小平的開放政策顯示出基督徒活動在中國是被容忍的，但當「國家」發現受威脅時，某種程度的迫害便會出現。

中國基督徒在歷史上所得的教訓，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資料；當共黨仍是統治者，那些傳福音的（或其他宗教信仰者）都沒有其他選擇，唯一的方法是與國家組織合作。今日中國的基督信仰仍然與西方有關係，不論對與否，它被視為來自西方的，因此與中國思想不相容。總之，對當權者來說，它仍然是個有危險性的意識形態。

有一種迄今還未嘗試的方式，就是將基督信仰

以當地的信念和習俗表達出來。傳教士曾經設法將基督信仰本地化，來適應當地的環境和需要，不再攻擊傳統；但他們更應該調節一下，或甚至運用傳統來解釋基督宗教的訊息。

儘管經歷了共黨四十年「中央集權」的政制，中國各地的差異竟然沒有絲毫改觀。南部沿岸地區發展得比其他地區快得多。促成這現象的因素十分複雜，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：縱使在極權主義下，南中國各地區的文化 and 經濟的相距十分大。

十九世紀一些傳教士曾嘗試採用地方語言來講道，例如採用粵語或福建話。如果要將基督徒信仰溶合於當地文化，那麼，必須付出比運用地方語言還多的努力。基督徒信仰如何有系統地傳給一些非儒學的聽眾呢？本文無意提供實質建議。這裏要提出的只有一點：中國福傳的重要關鍵是在於運用什麼方法才能適合「革命後」的中國。